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36期

2009年8月7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国际问题研究要关注政策与现实 ——“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学术性与政策性”学术研讨会综述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郭延军

2009年6月27～28日，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各高校、研究单位、学术刊物、出版社以及媒体的近40名学者专家参加了研讨会，中青年学者在与会者中占绝大多数。在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中，参会者围绕“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两个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关系

部分与会者认为，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研究，在学者的领域内都应该是学术性研究。确定学术性与否的标准是研究方法，或者说内行的符合规范的研究就是学术性研究。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内行的符合规范的政策研究同样是学术性的。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在谈到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差异时，并不是指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差异，而是指学院式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之间的鸿沟。有学者指出，在美国学界存在三个层次的研究：学院研究（指大学教授所做的学理性研究）、政策研究（主要在智库中进行）和直接出谋划策。学院派从事的纯理论性研究与政策之间是脱节的，而



智库从事的政策研究大多仍然属于学术性研究，并与决策者形成大量互动。但这并不表明理论与政策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事实上，理论对于政策具有诊断、预测和指导性的作用。

一些与会者认为，国际问题研究有两个导向：学术内导向和学术外导向，即理论导向与政策导向。理论服务于政策制定，而政策为外交行动提供指导，二者既有分工又是统一的，能够实现二者有效互动的理论工具是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 FPA）。外交政策分析关注角色与观念的选择，这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政策研究处于国际问题研究和国内政策研究的交界点，使得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可以把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更好地结合起来；它不但关注对行为体的研究，而且重视行为体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它强调不同理论流派之间更好地对话和融合。另一方面，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分析外交政策，也出现了诸如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等重要成果。有的学者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利于政策制定的几种知识类型：一是历史案例的方法。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历史案例来寻找当下问题的解决办法。但遗憾的是，他们所用的历史知识未必可靠，这时学者、尤其是研究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二是中层理论。与宏观理论不同，中层理论讨论的不是体系层面的抽象问题，而是提倡国际关系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加关注外交政策的制定。三是地区和国别研究。在政策过程中经常需要了解国别背景，只有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点，才能有助于政策的制定。

二、理论研究 with 政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学者常用理论来排斥实证性的、实际上比理论更复杂、更艰巨的政策研究，认为政策研究比理论研究更简单。这是一个误解。这从一个方面表明，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门槛问题，或者说是学术标准问题。如果都是学术性研究，学术性的政策研究并不比理论研究更轻松、更容易取得成果。所以，学术界应取得一个共识，即什么是学术性的政策研究？或者说真正的政策研究需要有什么样的学术规范与评判标准？另外，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真正的学术性政策研究需要具备何种基本要素？从美国的经验看，至少有四个要素是非常重要的：对研究对象的体验；良好的学术训练；外语水平；了解政策的渠道（Policy Access），即通过调研、访问、非公开资料的获取，加强对政策本身及政策过程的跟踪和了解。从研究层次看，体系层次、国家层次以及决策者层次上对于政策日益精细的研究，也有助于提高政策



研究的科学性与学术性。从研究范式看，理性主义基于理性选择的逻辑，与直接的政策研究关系更密切，而反思主义强调观念因素，在政策研究中运用较少。

在中国情境下讨论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的关系，面临着“超越双重困境”的任务。第一个困境是理论化工作尚未完成，缺乏原创性，这涉及到是否有可能基于中国的经验事实去开拓和发展中国式的理论建树；第二个困境是国际问题研究回归政策的困境。目前中国的政策研究的质量无法与国家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政策性研究缺乏独立性。研究人员面临着诸如话语的政治正确性、领导部门的意图、商业和部门利益、以网络为载体的民意等干扰因素。二是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和问题意识较为薄弱，很难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和高质量的政策建议。三是在研究人员专业化和分工不断深化的同时，相关专业领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不足。

政策研究的另外一个难点，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预测基础上的，而决策者需要的预测大多是局限在简单的结论或“怎么办”这一层次上，学者带着这一目的进行预测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甚至有可能走向历史预言的误区。因此，在预测的过程中，有必要区分历史预言和技术性预测。前者是不可靠的，而后者应当是科学的。

与会者认为，理论和现实的对话对于政策研究十分必要。在中国，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之所以存在鸿沟，其原因在于现有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体制的分化，表现为：权力核心的意识形态宣传、权力内部的政策研究以及权力之外的学术研究。这三种形态基本上是彼此分割的，决定了非学术的政策研究与学术性的政策研究之间很难实现对话。因此，发挥智库的中介作用对于实现理论和现实的对话就变得非常重要。

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

部分与会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面临三个困境：一是学科困境。具体表现在学科范围越来越大，安全、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交汇在一起。鉴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力的不足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有关建立中国特色国际问题研究的整体性宏大理论思考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议题，但这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二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困境。要在理论和政策研究上有所建树，只有深入研究中国，才能取得世界水平的成就。但目前的情况是国内学术批评的环境不够宽松，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术的发展和所研究的中国问题的深入程度。三是中西方话语系统的差异也限制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

一些与会者指出，要走出以上困境并推动中国国关学科的发展，应从以下四



个方面努力。第一，思考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边界和主题。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是在政治学基础上的一门交叉学科，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缺乏政治学基础，导致学者在研究中没有明确的价值观和研究主题。第二，重视实证和历史问题研究。除了纯理论问题，事实上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国别研究、功能性问题等实证性研究，这些研究必须建立在实际调查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做好这些研究有助于政策的制定。第三，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学术批评，同时避免流于形式和浮躁。第四，重视媒体和政策报告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应当是学者的一项社会责任。正如奈所说，学术成果应当产生社会效应，这也是学者自我完善的过程。与此同时，学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主要任务是知识生产，因此需要警惕学术娱乐化的倾向，以避免公共价值观的遗失和知识生产的断裂。

此外，与会者指出，探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方向，还必须把握国际政治发展的趋势与时代脉搏。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国际关系本身是否具有进步性？例如，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出现，是否标志着人类的进步？此次金融危机中的国际合作是否代表了国际关系的进步？全球化时代非国家行为体的大量出现是否会改变国际政治的现状，对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有没有积极意义？第二，国际关系是否正在走向真正的民主化？全球化时代的能源问题、气候问题、贫困问题、妇女问题等全球性议题，与传统的国际政治议题有所不同。这些新议题需要专家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趋向。第三，在民主化的同时，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时代的开放性决定了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国际政治，民主化也促进了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向下转移。另外，全球化时代的宗教因素、精神力量将会把人类引向何处，对国际政治有何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第四，部分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是否还“在西方的路灯下”？尽管目前中国在全球政治中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在全球议题的设定、实质问题的发言权、重要国际组织中的代表人数等方面，还远远落在后面。对中国学者的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甚至精神气质，都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实事求是的评估。

（提交给本次研讨会的论文将以“主题讨论”的方式，发表于《国际政治研究》季刊 2009 年第 3 期）

编辑：于铁军 审核：王缉思

网址：www.ciiss.pku.edu.cn

邮件地址：CISS@pku.edu.cn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电话：86-10-62756530

邮编：100871

传真：86-10-62759302